

青年入乡行为机制及其乡村治理对策响应

谷晓坤^{1,2}, 徐凯基³, 夏彬彬⁴, 许德娅⁵

(1.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030; 2.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 上海 200030; 3.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南京 210023; 4. 上海政法学院法治宣传教育学院, 上海 201701; 5.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上海 200241)

摘要: 当前, 全球城乡发展正经历从单向城市化向城乡要素双向对流的范式转变。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 中国青年入乡趋势持续增强, 但学界对其行为生成机制仍缺乏系统性阐释。以信息—动机—行为 (IMB) 模型为理论框架, 基于 2023—2025 年全国 27 个省级行政区的 1282 位入乡青年调查数据, 实证解析青年入乡的行为逻辑并提出治理对策。研究发现: 青年入乡遵循“信息刺激—动机重构—行为选择”的系统性路径, 而非孤立的个人决策; 在信息维度中, 内源性信息对入乡动机呈显著负向影响但正向作用于行为转化, 外源性信息可强效激发入乡动机但存在与现实场景的错配风险, 其中乡村政策制度认知的激励作用最为突出; 动机结构呈现“生活动机强于工作动机”的核心特征, 且明确稳定的动机是意愿转化为实际行为的关键因素。基于此, 从优化信息供给、提升乡村生活品质、拓宽在地发展路径三个维度, 提出支持鼓励青年入乡的治理对策, 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与乡村振兴人才支撑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 青年入乡; 信息—动机—行为; 城乡治理; 乡村振兴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城乡人口迁移^[1,2]。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1978—2024 年, 中国城镇人口从 1.7 亿增至 9.3 亿。然而, 长期以来从乡村到城市的单向人口流动, 在驱动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引发乡村“老龄化”与“空心化”等一系列问题, 城乡发展差距日益凸显^[3,4]。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构建新型城乡关系, 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 并陆续出台细化政策, 积极引导和支持青年人才流向乡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 畅通城乡要素流动”^[5];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城市人才服务乡村”; 2025 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 , 不断增添乡村发展动力活力”。

中国青年入乡实践与全球城乡发展范式的转型相呼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发布的《2023 年区域展望: 长期不平等地理》报告指出, 全球范围内正经历从“单向城市化”向“城乡对流”的发

收稿日期: 2025-09-09; 修订日期: 2026-01-29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2374139, 72074143)

作者简介: 谷晓坤 (1980-), 女, 河北宁晋人, 博士, 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国土空间治理、青年入乡与乡村转型、城市更新与科创街区。E-mail: guxk1980@sjtu.edu.cn

通讯作者: 许德娅 (1989-), 女, 天津河西人,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数字与移动传播、消费与文化研究、城乡公共政策。E-mail: dyxu@comm.ecnu.edu.cn

展范式转型^①,青年流入乡村现象在多个国家日益显现^[6]。在东亚,日本青年出于对高密度城市生活的反思,通过倡导“田园回归”推动了空心村的活化^[7];韩国近十年间从城市迁移到乡村的人口增长330倍,其中40岁以下青年占比达66%,为韩国乡村注入了新业态发展活力^[8]。然而,相较于日本的“品质型逃离”或韩国的“产业型回流”,中国青年入乡具有更为独特的制度逻辑:它是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等国家战略引导下,通过人才下乡推动城乡要素双向配置的过程^[9,10]。而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青年人口流入乡村的现象研究大多围绕“乡村绅士化”“逆城市化”等理论展开^[11],相关理论往往难以适配中国城乡关系的独特性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亟需立足本土情境构建解释框架^[12-14]。

本文聚焦于“入乡青年”这一主体,将其界定为“拥有3年以上连续稳定的城市工作和生活经历,而后主动选择短期或中长期驻留乡村,从事农业、文旅、新业态或公共服务等相关行业的青年群体”^②,并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相关定义将其年龄限定为入乡时45岁以下。这一概念界定,强调入乡青年具备城市积累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从而与以传统的灵活务工、季节性流动为特征的传统“返乡农民工”群体形成明确区分。相较于工商资本下乡、艺术乡建等乡村发展路径,青年入乡不仅为乡村补充活力人口,更承载着推动产业转型、公共服务创新与文化振兴的潜在价值^[15,16]。入乡青年凭借其活力、创造力及社会流动性,正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在乡村经济社会结构重构进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17]。

然而,青年入乡行为并非简单的线性决策,而是受到信息获取、动机形成、行为实践等多维因素的复杂影响,其行为逻辑同时受城乡资源与制度环境的综合制约。一方面,乡村的自然资源禀赋与生态环境承载力刚性划定了入乡发展的物理空间与可持续边界^[18,19];另一方面,土地流转、宅基地使用等政策安排,塑造了入乡行为选择的制度可行性与风险预期的形成^[20]。此外,乡村多样化的经济社会、生活服务、制度文化等构成的区域机会空间分异,也影响青年入乡的流动性与黏滞性^[21]。如何从理论层面系统阐释这一行为机制,已成为学界亟待解答的重要议题^[22,23]。既有研究虽已聚焦青年入乡动机^[15,16,24]及其入乡后的就业与创业行为^[17,25],但多局限于单一视角,缺乏对“信息—行为”全链条传导机制的系统整合;在研究方法上,多依赖于小样本或区域性调查^[26,27],缺乏基于大尺度数据的宏观实证检验,难以全面且深入地揭示青年入乡的复杂行为机制,限制了其对乡村治理政策优化的支撑作用。

信息—动机—行为(Information-Motivation-Behavior, IMB)模型起源于医学与健康传播领域^[28],其理论核心在于通过信息—动机—行为的链式传导机制来解释个体行为的发生过程。与传统的知识—态度—行为(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 KAP)模型或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相比,IMB模型不仅关注知识储备、态度转变,更强调动机在行为转化中的关键作用,从而能够更系统揭示行为的内在生成机制^[24,29]。具体至城乡人口流动与资源利用研究场景,KAP模型更倾向于线性刻画知识—态度—行为的顺序路径,难以有效表征资源与政策的外部约束条件;TPB模型虽能解释意向形成,但其变量结构对土地制度、自然资源约束等要素的映射较为间接^[30]。相较而言,

①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2023年区域展望:长期不平等的地理. 2023.10.

② 27省份青年入乡调研:还需更多制度性支持与政策性保障,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1585589.

IMB模型可将政策信息可得性与资源承载条件纳入信息与动机的具体可操作维度,从而解释不同资源禀赋、政策信息等区域机会结构下的行为差异^[31,32]。此外,针对乡村吸引力理论聚焦城市与乡村的宏观对比而忽略个体微观决策的局限^[21,33],IMB模型可将宏观因素具象化为核心的信息维度,并通过动机衔接信息与具体入乡行为,既承接了相关理论的宏观视角,又补充了个体层面信息—动机—行为完整的动态转化机制,使得理论阐释更具层次与完整性。同时,已有研究亦证实了该模型的适用性与稳健性:例如,入乡青年凭借城市生活与工作中积累的信息优势,显著提升了农业经营效率,体现出信息对行为的直接影响^[34];城市居民在获取乡村相关知识与政策信息后,其参与乡村发展的动机明显增强,验证了信息向动机的有效转化机制^[35]。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2023—2025年面向全国27个省级行政区的1282位入乡青年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青年入乡的信息—动机—行为(IMB)分析模型,实证分析青年入乡的内在行为机制,并据此提出乡村治理对策建议,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乡村振兴人才支撑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青年入乡的内涵界定与历史演进

青年入乡是青年群体基于国家战略引导、社会发展需求及个体发展选择,从城市流向并参与乡村生产建设、社会治理与价值创造的系统性过程^③,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绅士化”或“逆城市化”存在差异^[14]。青年入乡本质是城乡人口流动格局的动态再平衡,更是乡村振兴背景下社会经济结构重塑的关键组成部分,需在城乡空间关系演变、社会需求转型与个体选择逻辑的深度互动中加以阐释。从宏观层面看,高密度城市发展模式带来的资源约束,使部分青年面临就业竞争加剧、生活成本攀升与居住空间压缩等多重压力^[36,37];相比之下,乡村凭借较低的生活成本、优良的生态环境和政策支持创造的发展机遇,逐渐成为青年寻求替代性发展路径的重要方向^[22,38],这一城乡结构性张力构成了青年入乡的现实驱动力。与此同时,青年群体所具有的代际特征、高等教育背景和城市生活经历,也深刻重塑了其对乡村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使其入乡决策偏好结构呈现出动态变化特征^[39,40],进一步丰富了青年入乡的内涵层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青年入乡潮随时代演进历经三波发展,不同阶段均围绕城乡空间与社会需求两大核心要素展开,个体选择的参与度与作用性则随时代变迁逐步提升,三者的联动形态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第一波始于20世纪50年代,为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开发农村资源,国家以战略力量主导城乡空间调配,大量城市青年投身“上山下乡”活动。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城市发展机遇增多,大部分青年重新返回城市。这一阶段的青年入乡以国家意志为核心,个体选择服从于宏观层面的人口—空间资源调配需求。第二波始于2005年新农村建设战略提出后,社会层面的食品安全意识觉醒与互联网电商快速崛起,推动部分青年带着公益理想与商业思维回乡探索乡建;“新农人创业潮”的兴起,标志着社会需求成为影响青年入乡选择的关键力量,个体开始基于市场需

③ 27省份青年入乡调研:还需更多制度性支持与政策性保障,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1585589。

求与自身能力主动规划乡村发展路径。自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第三波青年入乡潮拉开序幕,此时城乡空间关系进一步优化。一方面,乡村智能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数字化与网络化技术广泛普及,有效缩小了城乡之间的虚拟空间鸿沟。另一方面,城市端则因高密度发展面临就业、生活成本等压力,叠加国家政策支持与青年代际认知迭代^[39,40],大量“新农人”“乡创客”带着技术创新热情与多元价值追求进入乡村。第三波青年入乡呈现出从政策主导驱动向市场自主驱动、从情怀型入乡向价值型入乡的转型,更是城乡空间、社会需求与个体选择的深度耦合的必然结果。

1.2 青年入乡行为信息—动机—行为(IMB)模型构建

为进一步系统解析青年入乡行为的复杂机制,本文引入信息—动机—行为(IMB)模型作为理论框架。该模型认为,个体行为的形成通常遵循信息(I)—动机(M)—行为(B)的演化路径:信息指个体掌握的与特定行为相关的知识,是重要构成动机形成的基础;动机反映个体对该行为目标的积极或消极态度评价,是驱动行为的核心心理机制;行为则是在具体情境中依托信息储备与动机驱动所做出的现实选择^[41]。基于IMB理论框架,青年入乡的信息、动机与行为三者之间也存在类似的传导逻辑,青年通过内外渠道获取入乡相关信息(I),进而形成基于认知与价值判断的入乡动机(M),最终在资源与情境约束下落实为具体入乡行为(B),据此构建青年入乡行为IMB模型分析框架(图1)。该框架直观呈现了青年从信息输入到动机形成,再到行为实现的完整路径,并反映出变量间可能存在的交互机制,为后续实证检验奠定了理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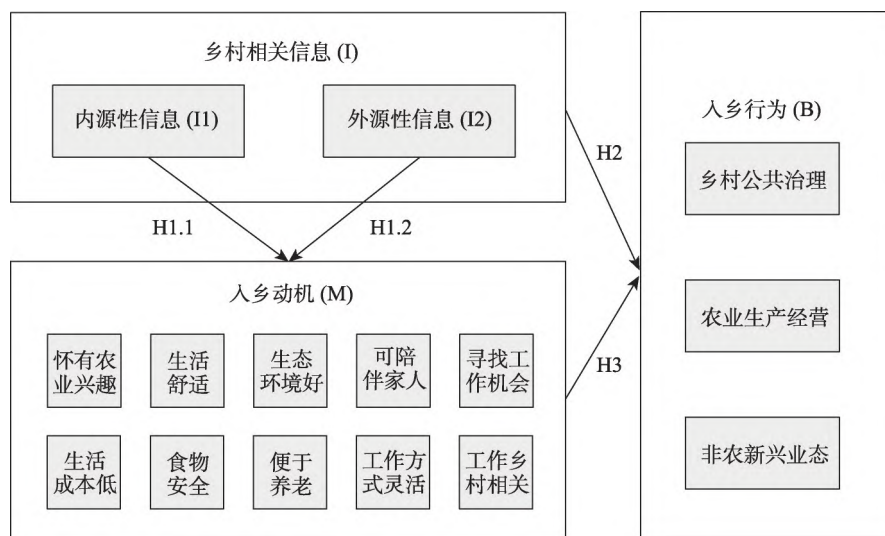


图1 青年入乡的IMB行为机制框架

Fig. 1 IMB model of youth migration to rural areas

从信息(I)维度看,借鉴旅游管理和形象认知领域的经典分类方法,将青年所掌握的关于乡村的知识与认知划分为内源性信息与外源性信息两类^[32]。内源性信息源于个体成长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经验与认知,主要包括入乡时间、年度乡村居住时间等。这类信息深刻影响青年对乡村的熟悉程度和情感归属,并直接塑造其对入乡可行性的判断。与之相对应,外源性信息来自即时性外部输入,如政策宣传、社会网络中的知识传递以及

他人入乡的案例示范等。这类信息帮助青年迅速把握乡村当前的发展态势与制度环境，例如对乡村政策的了解、对产业实践模式的认知以及对青年入乡现象的熟悉程度，均为外源性信息的典型体现^[42]。两类信息构成了青年入乡决策的知识基础，内源性信息奠定其个人经验，外源性信息则提供实时认知补充，共同支撑其动机的生成。

从动机（M）维度看，其核心反映青年入乡背后的心理驱动力与价值取向。借鉴已有研究^[31]，本文将其归纳为十个典型动机因素：怀有农业兴趣、生活成本低、生活舒适、食物安全、生态环境好、便于养老、可陪伴家人、工作方式灵活、寻找工作机会、工作与乡村相关。前六类动机主要聚焦对乡村生活环境与物质条件的关注，如生态、安全与成本等现实因素；后四类则更多关联情感归属、家庭责任与职业发展等社会性及个人价值实现需求^[43]。动机的多元构成不仅反映出青年入乡决策的复杂性，也为其后续职业路径的差异提供解释。例如，因农业兴趣而选择经营农业的青年，与出于家庭陪伴或生活方式偏好而投身乡村治理或非农新业态的青年，在具体行为选择上呈现显著差异。

从行为（B）维度看，主要表现为青年入乡后在职业与社会参与方面的具体行动。参考相关研究^[44]，本文将其划分为三类：一是参与乡村公共治理，如加入基层组织、提供公共服务或参与社会治理；二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涵盖传统种植、规模农业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模式；三是进入非农新兴业态，例如乡村旅游、文化创意、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活动等^[45]。这三类行为分别呼应不同的动机取向与资源条件，同时均受到外部政策与制度环境的制约与引导。

综上，青年入乡行为的IMB模型分析框架直观呈现了青年从信息输入到动机形成，再到行为实现的完整路径：一方面，内源性与外源性信息通过塑造青年对乡村的认知，间接影响其入乡动机；另一方面，动机的差异则显著预测其最终行为选择，包括参与公共治理、农业生产经营或非农新兴业态等不同路径。此外，信息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能跨越动机环节，直接对行为产生影响，即存在“信息—行为”的直达路径。基于上述理论建构，为检验信息、动机与行为三者间的逻辑关系，进一步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1：青年的内源性信息（I1）会显著影响青年的入乡动机（M）。

H1.2：青年的外源性信息（I2）会显著影响青年的入乡动机（M）。

H2：青年的内源性信息（I1）和外源性信息（I2）会显著影响青年入乡的行为（B）。

H3：青年的入乡动机（M）会显著影响青年入乡的行为（B）。

1.3 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共包括4个部分。第一部分测量青年的入乡动机（M），包括有农业兴趣、生活成本低、生活舒适、食物安全、生态环境好、便于养老、可陪伴家人、工作方式灵活、寻找工作机会、工作与乡村相关等10个因素。问卷采用7点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同意，7=非常同意）并对每类问题都询问2~3个条目，以确保每个测量变量的信度和效度。

第二部分测量青年所获取的乡村相关信息（I）。在内源性知识（I1）方面，调查青年对乡村的观念看法，包括已入乡的时间与每年在乡村居住的时间，这些因素会影响青年对于进入乡村的态度。在外源性知识（I2）方面，围绕三个维度设计问题：乡村政策制度认知水平（包括对于国家先后开展了“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重大

国家战略、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运营乡村”等乡村资源整合模式政策设计的了解),乡村实践模式认知水平(包括对于“网红村”“网红民宿”等乡村旅游热点、“田园综合体”“乡村振兴示范村”“未来乡村”等乡村建设方式的了解),青年入乡社会现象熟悉度(包括对于乡村精英及“乡贤”人群、“数字游民”等城市人口回归乡村的现象了解)。各项均采用7点李克特量表(1=完全不了解,7=非常了解)进行测量。

第三部分测量青年入乡行为(B)。采用7点李克特量表(1=完全未参与,7=积极参与),具体测试青年返回乡村后从事的乡村公共治理、农业生产经营、非农新兴业态三类工作的具体情况。

第四部分收集受访者的基本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出生地、先前在城市生活时间、先前在城市的职业、户籍状态。

1.4 数据收集

数据收集分为小样本预调查和正式调查两个阶段。首先,在正式投放问卷前,通过小样本测试开展问卷质量检验。于2023年7月通过问卷星平台回收有效问卷200份,并利用SPSS 22.0软件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剔除个别信度较低以及因子载荷小于0.5的题项,形成正式调查问卷。

在正式调查阶段,鉴于青年入乡行为的随机性及其空间分布的分散性,难以采用传统概率抽样方法开展,故采用便捷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混合抽样方法。具体实施中,通过招募来自全国103所高校且家乡在乡村的在读学生组建调研团队,基于其家庭具有的乡村社会网络关系,精准定位并筛选到符合条件的入乡青年,从而保障样本在地理空间上的覆盖度与代表性。分别于2023年7月、2024年2月和2025年2月开展三轮全国性调研,最终收集有效样本1282份,覆盖全国27个省级行政区、162个地级行政区、164个行政村,空间分布如图2所示。分析样本所在地的区位特征与社会经济属性后发现,调研乡村的交通条件相对较为便利,距离最近高铁站的平均距离为37.62 km,距离所属县级行政区行政中心的平均距离为26.10 km。乡村所属县级行政区2024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平均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下载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图2 调研样本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survey participants

值为878.80亿元，常住人口平均值为83.16万人，城镇化率平均值为57.65%。

整体而言，入乡青年群体呈现出“受教育程度高、职业多元性强、城市生活经验高”特征，如表1所示。入乡青年年龄区间为18~45岁，均值为35岁。从年龄结构来看，80后占比31.20%，90后占比33.62%，00后占比8.97%，印证了入乡青年是以年轻一代为主力的结构性流动。他们拥有显著的城市经历与教育优势：拥有5年以上城市生活经验占比69.03%，学历为本科及以上占比41.97%，城市户籍占比27.07%。青年先前在城市的职业多样，公务员与事业单位人员占比达到20.04%，企业人员占比23.87%，自由职业者占比最高，达35.34%。城市经历不仅提升了入乡青年的认知能力和组织经验，也为其在乡村落地创业、服务或治理等提供了重要支撑资源。

2 结果分析

首先，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对青年入乡动机进行潜在维度识别，为后续各变量的定量分析奠定基础。其次，构建分层回归模型，依次纳入人口学变量、内源性信息与外源性信息、入乡动机、入乡行为等变量，系统检验信息对动机的影响（H1）、信息对行为的影响（H2）以及动机对行为的作用（H3）。最后，基于定量分析结果，阐释信息—动机—行为三者之间的作用路径与逻辑关系，从而完整揭示青年入乡行为机制。

2.1 识别青年入乡动机（M）

因子分析是从大量相关变量中抽取出核心潜在维度并进行整合分析的有效途径。在自变量可能存在一定相关性时，通过因子分析可确保量表不存在较高（>0.5）的交叉负荷量，即每个条目只属于一个因素。本文使用主成分提取法和正交旋转法，对10个条目共27个问题进行因子分析，共得出10个因素，累计可解释原变量中74.58%的变异量。通过因子分析，表明本量表包含10个有独立解释能力的维度，建构效度良好。

因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青年的10个入乡动机分析结果均显著，且入乡动机呈现

表1 人口学因素描述性分析

Table 1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选项	频次/人	百分比/%
性别	男	652	50.86
	女	630	49.14
出生年份/年	1970—1979	336	26.21
	1980—1989	400	31.20
	1990—1999	431	33.62
	2000—2005	115	8.97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45	3.51
	初中	176	13.73
	中专、技校、职业高中	136	10.61
	普通高中	132	10.30
	大学专科	255	19.89
	大学本科	498	38.85
	研究生及以上	40	3.12
成长于城市或农村	城市	753	58.74
	农村	529	41.26
先前在城市生活时间/年	<5	397	30.97
	5~9	389	30.34
	10~19	219	17.08
	>20	277	21.61
先前在城市的职业	公务员	38	2.96
	事业单位	219	17.08
	企业人员	306	23.87
	自由职业	453	35.34
	其他	266	20.75
先前在城市的户籍状态	城市户口	347	27.07
	农村户口	935	72.93

注：样本量为1282人，下同。

表2 青年的入乡动机分析结果

Table 2 Factor analysis of motivation in youth migration to rural areas

因素	特征值	解释的方差/%	Cronbach's α	Mean	S.D.
怀有农业兴趣	3.302	7.649	0.758	4.012	1.758
生活成本低	3.091	6.513	0.763	5.702	1.213
生活舒适	2.919	5.693	0.745	5.758	1.154
食物安全	2.890	4.584	0.744	5.787	1.372
生态环境好	2.674	4.178	0.746	5.799	1.280
便于养老	2.661	3.663	0.754	5.711	1.371
可陪伴家人	2.453	3.513	0.764	5.868	1.437
工作方式灵活	2.204	3.288	0.770	4.823	1.831
寻找工作机会	2.093	3.106	0.786	3.620	1.493
工作与乡村相关	2.014	3.074	0.798	4.107	2.086

注：已通过巴特利特球形检验 ($P<0.001$)。

一定的差异。其中，可陪伴家人、生态环境好、食物安全动机最为强烈，均值（Mean）分别是5.868、5.799和5.787；青年的寻找工作机会、怀有农业兴趣、工作与乡村相关的动机较弱，均值分别是3.620、4.012、4.107。这表明青年在选择入乡时，对生活品质和家庭因素的考量优先于单纯的工作需求。这种动机差异启示，乡村在吸引青年方面，生活环境与氛围的营造至关重要，仅靠提供工作岗位可能不足以吸引青年长期扎根。

2.2 乡村信息（I）对青年入乡动机（M）的影响

采用分层回归法，以青年入乡动机为因变量，将人口学变量、内源性信息、外源性信息依次纳入模型作为自变量，建立多阶层回归模型，测量乡村信息（I）对青年入乡动机（M）的影响效应，结果如表3所示。

人口学变量对青年入乡动机存在差异化显著影响。女性的“怀有农业兴趣”（ $\beta=-0.084, P<0.001$ ）和“工作方式灵活”（ $\beta=-0.111, P<0.001$ ）动机显著高于男性；年轻群体对于“生活成本低”（ $\beta=-0.177, P<0.001$ ）、“生活舒适”（ $\beta=-0.147, P<0.001$ ）等多项生活动机上的诉求更强烈。受教育程度相对更低的群体受“工作方式灵活”（ $\beta=-0.207, P<0.001$ ）和“寻找工作机会”（ $\beta=-0.206, P<0.001$ ）的影响更甚。入乡前在城市生活时间越长，“可陪伴家人”（ $\beta=-0.122, P<0.001$ ）和“生活成本低”（ $\beta=-0.101, P<0.001$ ）的动机越弱，反而更加在意工作是否与乡村相关（ $\beta=0.089, P<0.001$ ）。整体而言，人口学变量对生活动机和部分工作相关动机的影响更为显著，且年龄、城市生活经历等变量的影响呈现一定规律。

在内源性信息对入乡动机的影响方面，已入乡时间会削弱青年的入乡的动机，具体表现为已入乡时间对于“怀有农业兴趣”（ $\beta=-0.069, P<0.05$ ）、“生活成本低”（ $\beta=-0.090, P<0.01$ ）、“生活舒适”（ $\beta=-0.066, P<0.05$ ）、“生态环境好”（ $\beta=-0.098, P<0.01$ ）、“工作方式灵活”（ $\beta=-0.087, P<0.01$ ）等动机均存在显著负面影响，其余动机维度影响不显著但整体呈负向倾向；每年在乡村居住的时间与入乡动机的关系均不显著。

在外源性信息对入乡动机的影响方面，乡村政策制度认知水平对入乡动机中工作与乡村相关的联结尤为显著（ $\beta=0.407, P<0.001$ ），除对“生活舒适”与“寻找工作机会”两个动机影响不显著以外，对其他八类动机均呈现显著正向作用；乡村实践模式认知水

表3 青年入乡动机的多层回归分析(标准化)

Table 3 Hierarchical regressions towards motivations of youth migration to rural areas (Standardized)

自变量	怀有农业兴趣	生活成本低	生活舒适	食物安全	生态环境好	便于养老	可陪伴家人	工作方式灵活	寻找工作机会	工作与乡村相关
第一层：人口学变量										
性别	-0.084***	0.028	0.041	-0.019	-0.046	0.051	0.031	-0.111***	-0.073**	-0.029
年龄	-0.091*	-0.177***	-0.147***	-0.143***	-0.139***	-0.097*	-0.115**	-0.122***	-0.001	0.034
教育程度	-0.031	-0.030	0.008	-0.057	-0.032	-0.042	-0.027	-0.207***	-0.206***	-0.028
家乡	0.062*	-0.104***	-0.061*	-0.049	-0.091***	-0.046	-0.132***	-0.011	0.026	0.053
入乡前在城市生活时间	0.049	-0.101***	-0.038	-0.014	-0.037	-0.058*	-0.122***	0.031	-0.059*	0.089***
职业	-0.003	0.009	0.039	0.026	-0.009	0.076**	0.075**	0.043	0.094***	-0.065**
户籍	0.038	0.048	0.021	0.061*	0.035	0.049	0.142***	0.016	0.053	0.024
调整后的R ² 增量	0.029	0.025	0.004	0.013	0.015	0.008	0.074	0.066	0.064	0.027
第二层：内源性信息										
入乡时间	-0.069*	-0.090**	-0.066*	-0.052	-0.098**	-0.023	-0.039	-0.087**	-0.025	0.027
每年在乡村居住的时间	0.010	-0.016	-0.027	-0.005	0.022	0.003	0.018	0.024	-0.038	0.009
调整后的R ² 增量	0.002	0.004	0.002	0.001	0.005	0.002	0.021	0.041	0.003	0.030
第三层：外源性信息										
乡村政策制度认知	0.312***	0.166***	0.251	0.216***	0.286***	0.209***	0.227***	0.231***	0.018	0.407***
乡村实践模式认知	0.024	0.045	0.128**	0.123**	0.056	0.090	0.032	0.110*	-0.002	-0.090*
青年入乡现象认知	0.157***	-0.021	0.033	0.002	0.011	0.060	-0.013	-0.065	0.105*	0.059
调整后的R ² 增量	0.196	0.031	0.137	0.095	0.107	0.990	0.034	0.071	0.007	0.107
R ²	0.235	0.069	0.151	0.117	0.135	0.117	0.136	0.149	0.083	0.172
调整后的全部R ²	0.227	0.060	0.143	0.109	0.127	0.109	0.128	0.141	0.074	0.164
F值	32.399	7.813	18.753	14.069	16.531	14.013	16.619	18.494	9.552	21.969

注：*表示 $P<0.05$ ；**表示 $P<0.01$ ；***表示 $P<0.001$ 。性别（0为女性，1为男性），家乡（0为乡村，1为城市），职业为先前在城市从事的职业（0为农业相关，1为其他），户籍（0为城市户口，1为农村户口）。下同。

平的正向影响效应次之，对“生活舒适”($\beta=0.128, P<0.01$)、“食物安全”($\beta=0.123, P<0.01$)、“工作方式灵活”($\beta=0.110, P<0.05$)等动机存在显著正向作用，其余维度影响相对温和；青年入乡现象熟悉度对入乡动机的影响程度最弱，仅对“怀有农业兴趣”($\beta=0.157, P<0.001$)和“寻找工作机会”($\beta=0.105, P<0.05$)呈现显著正向影响，对其余动机维度影响均不显著。这说明乡村向外传递积极信息，尤其是政策利好信息，对提升青年入乡动机有关键作用。

综上，研究假设 H1 得以验证，即入乡青年的内源性信息 (I1) 和外源性信息 (I2) 显著影响青年的入乡动机 (M)，且内源性信息 (I1) 基本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外源性信息 (I2) 基本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

2.3 乡村信息 (I) 和入乡动机 (M) 对入乡行为 (B) 的影响

构建多阶层回归模型，依次将青年的内源性信息 (I1) 和外源性信息 (I2)、入乡动机 (M) 作为自变量，将青年入乡的三种行为 (B) 作为因变量，实证检验各变量对入乡行为的影响关系，结果进而验证假设 H2 和假设 H3，结果如表 4 所示。

2.3.1 乡村信息 (I) 对青年入乡行为 (B) 的影响

青年获取的乡村相关信息对入乡行为整体呈正向影响。在内源性信息方面，已入乡时间对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呈现显著正向影响 ($\beta=0.081, P<0.01$)，每年在乡村居住时间对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beta=0.081, P<0.01$) 以及非农新业态 ($\beta=0.065, P<0.05$) 两类行为均呈现显著正向影响。在外源性信息方面，乡村政策制度认知水平对从事乡村公共治理呈现显著正向影响 ($\beta=0.150, P<0.001$)，对从事非农新业态呈现显著负向影响 ($\beta=-0.119, P<0.05$)；乡村实践模式认知水平对从事农业

表 4 对青年入乡行为的多层回归分析 (标准化)

Table 4 Hierarchical regressions towards behaviors of youth migration to rural areas (Standardized)

自变量	乡村公共治理	农业生产经营	非农新业态
第一层：人口学变量			
标准化系数 β			
性别	-0.017	0.059*	0.050
年龄	-0.089*	0.040	0.007
教育程度	-0.071*	0.103***	0.025
家乡	-0.055*	0.044	0.020
入乡前在城市生活时间	-0.063*	-0.001	-0.023
职业	0.183***	0.008	0.093***
户籍	0.069*	-0.009	-0.019
调整后的 R^2 增量	0.142	0.036	0.027
第二层：内源性信息			
入乡时间	-0.020	0.081**	0.026
每年在乡村居住的时间	0.008	0.081**	0.065*
调整后的 R^2 增量	0.012	0.011	0.002
第三层：外源性信息			
乡村政策制度认知	0.150***	-0.049	-0.119*
乡村实践模式认知	0.086	0.137***	0.167***
青年入乡现象认知	0.121**	-0.033	-0.090*
调整后的 R^2 增量	0.009	0.015	0.030
第四层：入乡动机			
怀有农业兴趣	0.051	0.302***	-0.197***
生活成本低	-0.038	0.035	-0.003
生活舒适	0.008	0.077	0.053
食物安全	0.029	0.033	0.017
生态环境好	-0.010	0.121***	0.097**
便于养老	0.032	0.059	0.070*
可陪伴家人	0.034	-0.029	0.029
工作方式灵活	0.147***	-0.157***	-0.033
寻找工作机会	0.061*	0.115***	-0.058*
工作与乡村相关	0.134***	0.116***	0.179***
调整后的 R^2 增量	0.036	0.192	0.113
R^2	0.213	0.266	0.186
调整后的全部 R^2	0.199	0.253	0.172
F 值	15.456	20.709	13.108

生产经营 ($\beta=0.137$, $P<0.001$) 与非农新业态 ($\beta=0.167$, $P<0.001$) 均呈现显著正向影响; 青年入乡现象认知对从事乡村公共治理呈现显著正向影响 ($\beta=0.121$, $P<0.01$), 对从事非农新业态呈现显著负向影响 ($\beta=-0.090$, $P<0.05$)。

综上, 研究假设H2得以验证, 即入乡青年的内源性信息(I1)和外源性信息(I2)会显著影响青年入乡的行为(B), 且内源性信息(I1)基本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 外源性信息(I2)则兼具正向与负向影响, 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

2.3.2 青年的入乡动机(M)对入乡行为(B)的影响

青年的入乡动机对入乡行为整体呈正向主导影响。具体来看, 怀有农业兴趣对农业生产经营呈现最强的正向驱动 ($\beta=0.302$, $P<0.001$), 但对非农新业态呈显著负向影响 ($\beta=-0.197$, $P<0.001$); 生态环境好对农业生产经营 ($\beta=0.121$, $P<0.001$) 与非农新业态 ($\beta=0.097$, $P<0.01$) 均有显著正向作用, 是兼顾两类产业行为的重要动机。工作方式灵活对乡村公共治理表现为显著正向影响 ($\beta=0.147$, $P<0.001$), 却对农业生产经营呈显著负向效应 ($\beta=-0.157$, $P<0.001$); 寻找工作机会对农业生产经营有正向推动作用 ($\beta=0.115$, $P<0.001$), 但对非农新业态呈显著负向影响 ($\beta=-0.058$, $P<0.05$)。工作与乡村相关是最有效的正向动机, 对乡村公共治理 ($\beta=0.134$, $P<0.001$)、农业生产经营 ($\beta=0.116$, $P<0.001$)、非农新业态 ($\beta=0.179$, $P<0.001$) 三类行为均呈现显著正向影响。此外, 便于养老对非农新业态 ($\beta=0.070$, $P<0.05$)、生活舒适对农业生产经营 ($\beta=0.077$) 分别存在弱正向关联, 而生活成本低、食物安全、可陪伴家人等动机对入乡行为的影响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整体作用相对有限。总之, 研究假设H3得以验证, 青年的入乡动机(M)会显著影响其入乡的行为(B), 且不同动机维度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化特征。

2.4 基于IMB的青年入乡行为机制分析

青年入乡决策并非仅单纯依赖于个人意愿或资源禀赋, 而是在外部信息刺激、动机重构与行为选择的持续推动下形成的系统性行为过程。实证结果验证了本文构建的IMB研究框架的有效性与適切性, 表明青年入乡是信息与动机双向驱动的社会行为, 而非孤立的个人决策(表5)。

2.4.1 乡村相关信息对青年入乡动机与行为均具有显著影响, 且影响机制呈现异质性

在对动机的影响方面(假设H1成立), 内源性信息与外源性信息呈现出相反的作用方向: 内源性信息在多数情境下会抑制青年入乡动机, 这既反映出青年城市社会化经历所形成的对乡村的疏离感, 也与青年对乡村固有问题的认知相关; 而外源性信息则显著强化青年入乡动机, 其中乡村政策制度认知水平对入乡动机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 乡村实践模式认知水平正向影响次之, 青年入乡现象熟悉程度影响最弱, 这凸显了宏观信息环境在塑造青年入乡意愿中的关键作用, 也印证了青年入乡不仅取决于个体经验, 更深受政策制度与社会舆论环境的引导。

在对行为的影响方面(假设H2成立), 内源性信息与外源性信息的作用同样有所区别: 内源性信息往往通过情感归属与家庭责任等内在纽带机制推动青年开展实际入乡行动, 其中已入乡时间对青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呈现显著正向影响, 每年在乡村居住时间对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与非农新业态均呈现显著正向影响, 凸显了时间积累所强化的情感归属对行为的推动效用。相比之下, 外源性信息对青年入乡行为的影响机制则更为复

表5 青年入乡行为分析结果

Table 5 Analysis of behaviors in youth migration to rural areas

假设	影响结果	影响
H1.1: 青年的内源性信息会显著影响青年的入乡动机 (M)	入乡时间—>入乡动机	负向
H1.2: 青年的外源性信息 (I2) 会显著影响青年的入乡动机 (M)	乡村政策制度认知水平—>入乡动机	正向
	乡村实践模式水平—>入乡动机	正向
	青年入乡现象熟悉—>入乡动机	正向
H2: 青年的内源性信息 (I1) 和外源性信息 (I2) 会显著影响青年入乡的行为 (B)	入乡时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正向
	每年在乡村居住时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正向
	每年在乡村居住时间—>从事非农新兴业态	正向
	乡村政策制度认知水平—>从事乡村公共治理	正向
	乡村政策制度认知水平—>从事非农新兴业态	负向
	乡村实践模式认知水平—>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正向
	乡村实践模式认知水平—>从事非农新兴业态	正向
	青年入乡现象熟悉—>从事乡村公共治理	正向
	青年入乡现象熟悉—>从事非农新兴业态	负向
	怀有农业兴趣—>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正向
H3: 青年的入乡动机 (M) 会显著影响青年入乡的行为 (B)	怀有农业兴趣—>从事非农新兴业态	正向
	生态环境好—>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正向
	生态环境好—>从事非农新兴业态	正向
	工作方式灵活—>从事乡村公共治理	正向
	工作方式灵活—>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负向
	寻找工作机会—>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正向
	寻找工作机会—>从事非农新兴业态	负向
	工作与乡村相关—>从事乡村公共治理	正向
	工作与乡村相关—>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正向
	工作与乡村相关—>从事非农新兴业态	正向

杂，不仅呈现出显著的双向效应，尤其需要强调可能存在与乡村发展现实场景的适配偏差。例如，政策宣传内容与非农新兴业态的实际需求脱节，或对入乡前景过度渲染，导致青年心理预期高于乡村发展现实条件，从而抑制其投身新兴业态的意愿。因此，政策传播中需重点关注信息内容与地方实际、业态特征的适配性，以精准引导青年入乡行为，有效弥合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距。

2.4.2 青年入乡动机对行为具有正向主导影响,且是意愿转化为行动的关键因素

青年入乡动机作为连接信息刺激与行为实践的关键变量，其对入乡行为的正向主导作用（假设H3成立），不仅体现在统计层面的显著相关性，更深度契合城乡要素流动背景下青年的价值诉求与选择逻辑。

从动机属性来看，青年入乡动机具有多样性且存在显著差异，可陪伴家人、生态环境好、食物安全等生活动机最为强烈，寻找工作机会、怀有农业兴趣、工作与乡村相关等工作动机相对较弱，即生活动机显著于工作动机。这一结果深刻反映了新时代青年入乡决策的价值转向，即相较于单纯的职业发展诉求，青年更看重乡村所能提供的情感归

属、生活品质与安全保障，这种生活动机优先的选择倾向，本质上是对城市高密度发展模式下工作与生活失衡困境的主动规避，也是乡村生态价值与生活价值被重新认知的直接体现。

从动机对行为的差异化驱动路径来看，不同维度的动机通过匹配乡村不同产业形态的核心特征，形成了针对性的行为引导效应。怀有农业兴趣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最强正向驱动因素，其背后是青年对传统农业转型升级的期待与参与意愿，这类青年往往更倾向于投身规模化种植、特色养殖等农业生产活动，并借助城市积累的技术与市场资源推动农业现代化；而生态环境好作为兼顾农业生产经营与非农新兴业态的重要动机，既契合了绿色农业生态优先的新发展理念，也为乡村旅游、康养度假等非农业态提供了核心吸引力支撑，成为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动机的明确性与稳定性直接决定了意愿向行为转化的效率。实证数据显示，生活动机中除生活成本低、食物安全、可陪伴家人外，其余维度均对特定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而这些动机的共性特征在于其长期性与不可替代性：生态环境的改善、生活品质的提升、家庭陪伴的需求等，均无法通过短期城市生活获得满足，这种刚性需求促使青年形成稳定的入乡意愿，并最终转化为长期驻留行为；相比之下，工作动机的波动性较强，若乡村未能提供匹配的职业发展空间，青年的入乡意愿容易弱化，甚至出现“短期尝试后退出”的现象。这一特征启示，动机不仅是行为的驱动力，更是行为持续性的保障，只有当青年形成兼具个人诉求与乡村发展契合度的稳定动机时，才能真正实现从短期入乡到长期扎根的转变。

2.5 乡村治理对策响应

如前文所述，青年入乡是可通过信息调控和动机引导干预的系统性过程，而非完全随机的个体自发选择。因此，从优化信息供给、提升乡村生活品质、拓宽在地发展路径三个维度，提出支持鼓励青年入乡的治理对策。

2.5.1 构建适配青年认知特征的差异化信息传播体系，强化信息对动机的前置引导作用

基于内源性信息与外源性信息存在差异化影响，需突破单向度宣传的传统思路，构建适配青年认知特征的差异化信息传播策略，为精准引导青年入乡筑牢信息基础。（1）强化外源性信息的系统性供给与高效传播，整合自然资源（尤其是耕地）的保护利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自然资源政策，以及面向青年的人才、金融等专项措施，清晰传递政策内容、申请流程与实践案例；同时线下依托乡镇政务服务中心、乡村振兴工作站设立“青年入乡咨询窗口”，提供政策咨询解读服务，增强青年对政策的认知深度与可信度。（2）激活内源性信息的正向价值，形成以促进情感归属为核心的内源性信息传播方案，鼓励长期在乡青年通过短视频、社区分享会等形式，分享在乡村真实的生活体验与实践经验，以鲜活叙事引发情感共鸣。基层政府可通过技术培训、资源对接等方式塑造具有吸引力的“乡村代言人”，强化青年与乡村的信息互通与情感连接，激发青年对于乡村更广泛的认同与向往，进一步将内源性信息转化为稳固且积极的情感归属。（3）需审慎应对信息的潜在负向影响。例如，土地违法处置等外源性政策信息在提升认知的同时，可能因凸显实践挑战而抑制参与动机。在秉持真实报道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客观的信息环境帮助青年建立合理预期，有效规避因预期与现实脱节引发的认知失调与人才流失。

2.5.2 紧扣青年入乡生活活动机主导的核心特征,以提升乡村生活品质为抓手构建保障体系,增强青年扎根意愿

(1) 提升生态人居环境,建议扩大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范围,将环境整治、生态修复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统筹纳入整治规划,同时鼓励青年参与庭院绿化、村落美化等志愿活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乡村物理空间。针对住房需求,盘活闲置农房打造“青年安居公寓”,提供拎包入住、租金减免等优惠政策。(2) 完善公共资源供给,加快推动优质资源下沉落地,通过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提升乡村学校教学质量,完善乡镇卫生院与村卫生室的诊疗设备配置及服务能力。(3) 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聚焦青年数字化生活习惯,推进乡村5G网络与光纤宽带全覆盖,在村落核心区域设置智能快递柜,增加乡村图书馆等优质文化配套设施,并引导入乡青年积极利用公共空间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全方位满足其精神生活需求。

2.5.3 聚焦青年入乡后的发展诉求,以激发创业就业活力为核心构建支持体系,拓宽在地发展路径

(1) 夯实创业就业基础保障,联合本地企业、合作社开发“青年岗位库”,定向设置农业技术员、涉农电商运营、乡村治理助理等适配岗位;为入乡创业青年落实创业补贴、低息贷款等政策,建设配套完善的乡村创业孵化基地,并对接电商平台开展直播带货、网店运营等实战培训,持续优化乡村营商环境。(2) 实施分类扶持的精准策略:对参与乡村治理的青年,畅通职业晋升通道,鼓励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村务管理;对从事农业经营的青年,强化种粮补贴、农业保险等政策落地,支持打造区域公共品牌并延伸产业链;对投身非农新业态的青年,加快5G网络与物流站点建设,盘活闲置资源打造“乡村创客空间”并给予租金减免,通过具体的文旅推活动助力对接客源市场,形成良性发展循环。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基于全国27个省级行政区1282位入乡青年的调查数据,运用信息—动机—行为(IMB)模型系统解析青年入乡行为机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青年入乡并非孤立个人选择,而是遵循信息刺激—动机重构—行为选择的系统性过程,验证了IMB模型在城乡人口流动研究领域的适配性与解释力,超越了传统研究对青年入乡行为单因素归因的认知局限,为解析城乡人口逆流动现象提供了兼具微观决策逻辑与宏观情境关联的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第二,将青年入乡信息划分为内源性与外源性两类,清晰揭示了二者在动机形成与行为转化中的差异化作用机制:内源性信息虽对入乡动机呈削弱作用,但可通过提升情感归属促进行为转化,反映出个体过往乡村经验对入乡行为的复杂作用;外源性信息对入乡动机具有显著正向激发作用,其中乡村政策制度认知的激励效应最为突出,而外源性信息与乡村发展现实场景的错配风险,可能抑制青年参与非农新兴业态的意愿。研究细化了信息—行为传导路径的异质性特征,揭示了信息影响青年入乡决策的多元路径。

第三,青年入乡动机呈现生活活动机强于工作动机的显著特征,可陪伴家人、生态环境好、食物安全等生活活动机的强度明显高于寻找工作机会、农业兴趣等工作动机。同时,明确稳定的动机是入乡意愿转化为实际行为的核心因素。研究结论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经

济动因决定论的片面性,印证了在城乡高质量发展阶段,乡村的生态价值与生活价值已成为吸引青年人才回流的关键因素,为政策优化提供了新视角下的实证支撑。

3.2 讨论

青年入乡的数据收集难度大,尽管本文历经三年调查,收集了全国1282位入乡青年的数据,为理解该群体的入乡行为提供了扎实的经验证据,但在样本与数据层面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在抽样方法方面,本文采用便捷抽样与滚雪球抽样方法,样本主要来源于研究团队可触及的入乡青年,虽覆盖27个省级行政区,但中西部及偏远地区样本占比相对不足。这一样本分布特征虽反映了当前青年入乡的区域集聚现实,但也制约了研究结论在全国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类型乡村中的推广适用性,未来可依据乡村发展水平与区位特征进行科学分层,结合长时间序列调研追踪与对照组设计,进一步提升数据的代表性与解释力。在研究设计方面,本文采用了横截面数据,仅能捕捉特定时点青年入乡的信息接触、动机状态与行为选择,未追踪青年入乡后不同阶段各核心变量的动态演变过程,可能导致对行为机制的理解存在片面性。此外,研究对“行为体验反向影响动机”等反向因果关系的关注不足,未能充分揭示入乡行为与动机之间的双向互动逻辑。未来将进一步针对上述不足之处持续开展研究,从而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对策。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马忠东.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口迁移变动趋势: 基于人口普查和1%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中国人口科学, 2019, 33(3): 16-28, 126. [MA Z D. Trends of migration in China in four-decades of economic reform: An analysis based on censuses and 1% national population surveys.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19, 33(3): 16-28, 126.]
- [2] 沈建法. 中国人口迁移, 流动人口与城市化: 现实, 理论与对策. 地理研究, 2019, 38(1): 33-44. [SHEN J F. Migration,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Realities, theories, and strategie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1): 33-44.]
- [3] LONG H L, LIU Y S, LI X B, et al. Building new countryside in China: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Land Use Policy, 2010, 27(2): 457-470.
- [4] 刘彦随, 刘玉. 中国农村空心化问题研究的进展与展望. 地理研究, 2010, 29(1): 35-42. [LIU Y S, LIU Y. Progress and prospect on the study of rural hollowing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0, 29(1): 35-42.]
- [5] 中共中央.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https://www.mofcom.gov.cn/ddesdjsxxpt/wjhb/art/2022/art_38e47fd795f3490a96a7362ed21accab.html, 2022-10-25.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 Report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ttps://www.mofcom.gov.cn/ddesdjsxxpt/wjhb/art/2022/art_38e47fd795f3490a96a7362ed21accab.html, 2022-10-25.]
- [6] CARRASCO-CRUZ A, CRUZ-SOUZA F. Return to the rural: Ambivalent place attachment among youth in rural Spain.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5, 119: 103724, Doi: 10.1016/j.jrurstud.2025.103724.
- [7] JI N Y. Return to the countryside: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young urbanites in Japan's shrinking region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4, 107: 103254, Doi: 10.1016/j.jrurstud.2024.103254.
- [8] YOU E Y, ASHOURIZADEH S, ADU-AMPONG E A, et al. Inventing lively rural areas: Characteristics, motivations, and regional triggers of young in-migrant tourism entrepreneurs in South Korea.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5, 120: 103842, Doi: 10.1016/j.jrurstud.2025.103842.
- [9] 李玉恒, 阎佳玉, 宋传垚. 乡村振兴与可持续发展: 国际典型案例剖析及其启示. 地理研究, 2019, 38(3): 595-604. [LI Y H, YAN J Y, SONG C Y.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ypical case analysis and its enlightenment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3): 595-604.]
- [10] LI Y H, WESTLUND H, LIU Y S. Why some rural areas decline while some others not: An overview of rural evolution in the world.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9, 68: 135-143.
- [11] PHILLIPS M. Counterurbanisation and rural gentrification: An exploration of the terms.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 2010, 16(6): 539-558.
- [12] 李玉恒, 阎佳玉, 刘彦随. 基于乡村弹性的乡村振兴理论认知与路径研究. 地理学报, 2019, 74(10): 2001-2010. [LI Y H, YAN J Y, LIU Y S. The cognition and path analysi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ory based on rural resilie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10): 2001-2010.]
- [13] LI Y H, HUANG H Q, SONG C Y. The nexu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analysis. Growth and Change, 2022, 53(3): 1037-1051.
- [14] 黄幸, 宋伟轩, 谭华云, 等. 中国式绅士化的本土理论、方法与路径探索研究. 人文地理, 2025, 40(4): 1-12. [HUANG X, SONG W X, TAN H Y, et al. The dialogue in theories, methodologies and pathways of gentrification in Chinese context. Human Geography, 2025, 40(4): 1-12.]
- [15] 王培丞, 张煜婕. “他/她为什么回来了”: 小镇青年社会流动性重构的民族志调查. 中国青年研究, 2025, (5): 101-109. [WANG P C, ZHANG Y J. Why did He/she come back: Ethnographic investigation of reconstruction social mobility for town youth. China Youth Study, 2025, (5): 101-109.]
- [16] 朱战辉. 返乡青年的媒介实践与县域城市融入机制分析. 中国青年研究, 2024, (3): 69-77. [ZHU Z H. Analysis on the media practice of returned youth and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county cities. China Youth Study, 2024, (3): 69-77.]
- [17] YUAN C H, WANG D J, HONG L H, et al. Coming back home to start up a business? A comparison between youth from rural and urban backgrounds in China.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2, 13: 962419, Doi: 10.3389/fpsyg.2022.962419.
- [18] 何亚芬, 潘依玲, 谢花林.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乡村文化振兴双向赋能的机制与路径: 基于“人—文—术—业—制”五维协同视角.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40(11): 2979-2998. [HE Y F, PAN Y L, XIE H L. The mechanism and pathway of bidirectional empowerment between value realization of ecological products and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human-culture-technology-industry-institution" five-dimensional synergy perspectiv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5, 40(11): 2979-2998.]
- [19] 唐秀美, 蔡玉梅, 刘玉, 等.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自然资源综合利用效益评估方法与实证. 自然资源学报, 2022, 37(9): 2418-2428. [TANG X M, CAI Y M, LIU Y, et al. The evalu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benefi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2, 37(9): 2418-2428.]
- [20] 李星佚, 董渤, 杜欣蔚, 等. 农户承包地流转行为对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机制: 来自全国4275户农户的经验证据.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40(7): 1933-1950. [LI X Y, DONG B, DU X W, et al.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farmers' contracted land transfer behavior on the willingness to homestead withdrawal: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4275 households nationwide.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5, 40(7): 1933-1950.]
- [21] 朱佩娟, 邹志坚, 林明杰, 等. 中国区域机会空间分异及其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40(7): 1795-1815. [ZHU P J, ZOU Z J, LIN M J, et 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regional opportunities in China and its impact on population migration. Journal of Natural Resources, 2025, 40(7): 1795-1815.]
- [22] CHEN M X, LIU W D, LU D D. Challenges and the way forward in China's new-type urbanization. Land Use Policy, 2016, 55: 334-339.
- [23] MILBOURNE P, KITCHEN L. Rural mobilities: Connecting movement and fixity in rural place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4, 34: 326-336.
- [24] ROSENSTOCK I M.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health belief model. Health Education Monographs, 1974, 2(4): 328-335.
- [25] BAO A Z, PANG G F, ZENG G P. Entrepreneurial effect of rural return migrants: Evidence from China.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2, 13: 1078199, Doi: 10.3389/fpsyg.2022.1078199.
- [26] WOODS M. Rural Geography: Processes, Responses and Experiences in Rural Restructuring. London: Sage, 2005: 12-31.
- [27] WU X H, CHEN L, MA L, et al. Return migration, rural household investment decis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Evidence from rural Guangdong, China. Growth and Change, 2023, 54(1): 304-325.
- [28] FISHER J D, FISHER W A, WILLIAMS S S, et al. Empirical tests of an information-motivation-behavioral skills model of AIDS-preventive behavior with gay men and heterosexual university students. Health Psychology, 1994, 13(3): 238-250.
- [29] 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 50(2): 179-

211.

- [30] 王俊龙, 郭贯成, 韩述. 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农民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其代际差异: 江苏宿迁的调研证据. 经济地理, 2024, 44(5): 172-181. [WANG J L, GUO G C, HAN S. Farmers' willingness for rural residential land withdrawal and its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planned behavior theory: Evidence from micro research in Suqian, Jiangsu. *Economic Geography*, 2024, 44(5): 172-181.]
- [31] GU X K, XU D Y, XU M Y, et al. Measuring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multifunctional land use in peri-urban areas of three Chinese megacities: Suggestions for governance from a demand perspective. *Cities*, 2022, 126: 103703, Doi: 10.1016/j.cities.2022.103703.
- [32] 黄庆龙, 陈美球, 张馥林, 等. 基于IMB干预模型农户低碳稻作采纳行为研究: 以江西省2173份农户调查为例.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3, 32(12): 2661-2672. [HUANG Q L, CHEN M Q, ZHANG F L, et al. Research on low carbon rice farming behavior based on IMB intervention model: A survey of 2 173 farmers in Jiangxi province.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23, 32(12): 2661-2672.]
- [33] 周国华, 谭华云, 殷章馨. 地理学视角的乡村吸引力研究框架与重要议题. 地理学报, 2024, 79(10): 2460-2476. [ZHOU G H, TAN H Y, YIN Z X.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important issues of rural attraction: An integrated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4, 79(10): 2460-2476.]
- [34] 戴柳燕, 周国华, 何兰. 乡村吸引力的概念及其形成机制. 经济地理, 2019, 39(8): 177-184. [DAI L Y, ZHOU G H, HE L. Rural attraction: Concept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8): 177-184.]
- [35] ZHANG C, SUN Y D, HU R F, et al. The impact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experience on fertilizer use: Evidence from rice produc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1, 280: 124429, Doi: 10.1016/j.jclepro.2020.124429.
- [36] XU D Y, GU X K, XU M Y, et al. How can land-use practices be modeled? Understanding the influence of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emotional connections on urban residents' behavioral intentions regarding peri-urban areas from an MLU perspective.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24, 145: 103038, Doi: 10.1016/j.habitatint.2024.103038.
- [37] MA L, HE Q L, LONG H L, et al. Rural return migration in the post COVID-19 China: Incentives and barrier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4, 107: 103258, Doi: 10.1016/j.jrurstud.2024.103258.
- [38] ZHOU J, TANG S S. Attitudes towards rural migrant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return migration in China.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22, 28(3): e2509, Doi: 10.1002/psp.2509.
- [39] LIU Y S, LI Y H. 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 *Nature*, 2017, 548(7667): 275-277.
- [40] LI T Y, CHEN P Y, LU L, et al. Understanding return migration's decisions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 from a family perspective: Evidence from Guzhu village in China.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25, 163: 103476, Doi: 10.1016/j.habitatint.2025.103476.
- [41] WANG L. A narrative study of why young people go 'back-to-the-land':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lf-identity theory.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5, 120: 103832, Doi: 10.1016/j.jrurstud.2025.103832.
- [42] 谷晓坤, 李小天, 许德娅, 等. 大城市居民对周边乡村多功能转型的响应: 基于“知识—态度—行为”(KAP)模型的分析. 地理研究, 2023, 42(6): 1598-1612. [GU X K, LI X T, XU D Y, et al. Responses of urban residents to rural multi-functional transition in the peri-urban areas: Analysis based on the "Knowledge-Attitude-Behavior" (KAP) Model.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3, 42(6): 1598-1612.]
- [43] LI A H F. E-commerce and Taobao villages. *China Perspectives*, 2017, 1: 57-62.
- [44] WANG Y, JIANG Y Y, GENG B J, et al. Determinants of returnees' entrepreneurship in rural marginal China.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2, 94: 429-438.
- [45] HU Y S, WANG Y H, ZHANG P L. Anti-urbaniz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return migrants in China.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3, 103: 103102, Doi: 10.1016/j.jrurstud.2023.103102.

Mechanisms of youth migration to rural areas and policy responses of rural governance

GU Xiao-kun^{1,2}, XU Kai-ji³, XIA Bin-bin⁴, XU De-ya⁵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2. China Institute for Urban Governanc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3.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Ocean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4. School of Legal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701, China; 5.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Currently, global urban-rural development is undergoing a paradigm shift from unidirectional urbanization to the bi-directional flow of factor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Driven by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trend of youth-to-rural migration continues to strengthen, yet academia still lacks a systematic explanation of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is behavior. Employing the "Information-Motivation-Behavior" (IMB) model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behavioral logic of the youth migrating to the rural areas, drawing on survey data from 1282 respondents across 27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in China between 2023 and 2025. Findings indicate that youth-to-rural migration follows a systematic pathway of "information stimulation-motivation reconstruction-behavioral selection", rather than isolated individual decisions. Regarding the information dimension, endogenous information exert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n motivation but positively impacts behavioral conversion; exogenous information strongly stimulates migration motivation yet carries risks of mismatch with real-world scenarios, with awareness of rural policy systems demonstrating the most pronounced incentive effect. The motivational structure is characterized by "life rationality outweighing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where life-oriented motivations (e.g., family companionship,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ignificantly outweigh work-oriented motivations (e.g., job seeking). Furthermore, clear and stable motivations serve as key factors in transforming intention into actual behavior. Accordingly, this research proposes governance strategies to support and encourage youth migration to rural area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optimizing information supply, enhancing rural living quality, and broadening local development pathways. This study provide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facilitating two-way flows of urban-rural factors and strengthening talent suppor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youth migration to rural areas; information-motivation-behavior; urban-rural governance; rural revitalization